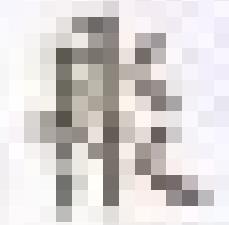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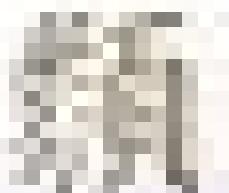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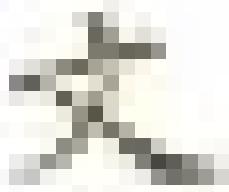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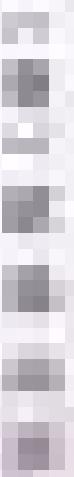


〔唐〕歐陽詢撰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撰

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

類

聚

〔附索引〕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藝文類聚

(附索引)

(精裝二冊)

(唐)歐陽詢撰

汪紹楹校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此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无錫群眾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0.5 插頁 11 字數 1,368,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2年1月新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數：41,000—10,500

統一書號：17186·25 定價：(精) 9.10元

藝文類聚卷第八

山部下 虎丘山

荆山

陽

石頭山

石門山

湖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物載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廣水 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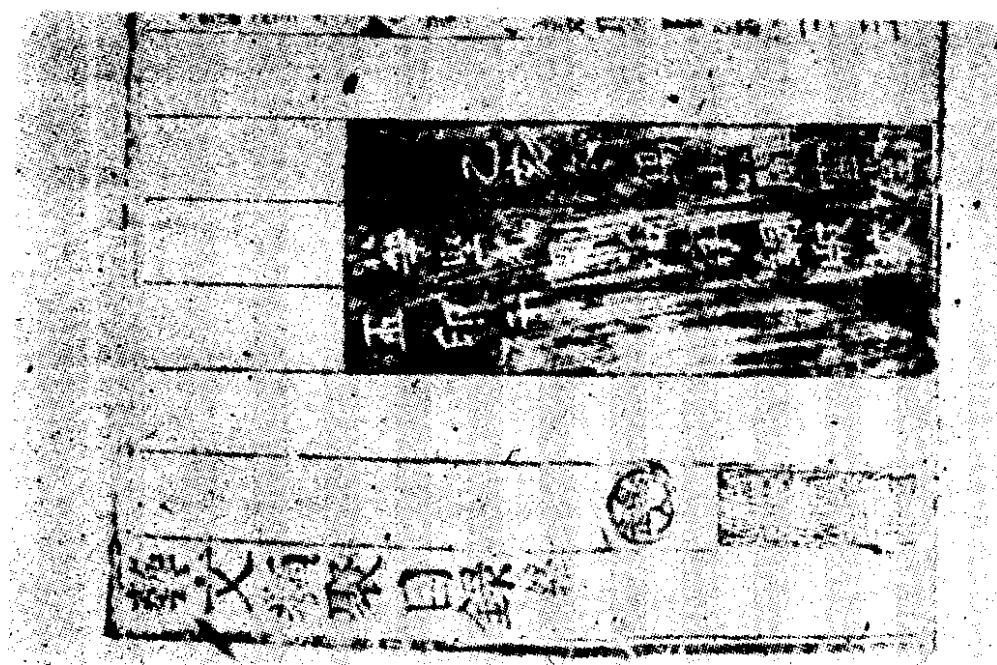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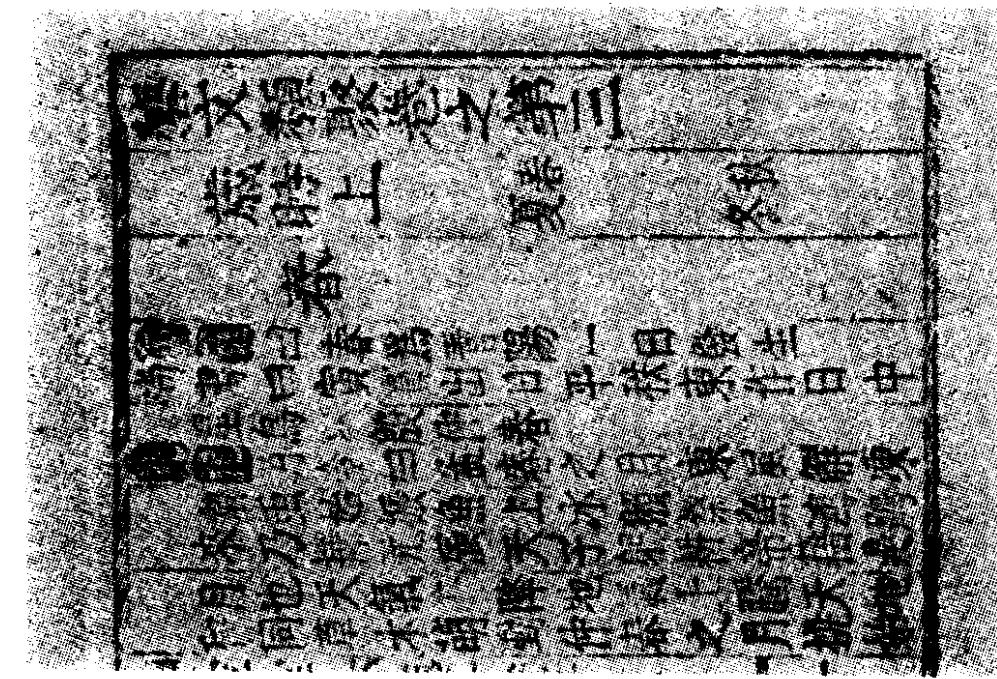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吳越春秋曰閶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寺蓋爲川林模倣上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揜土家池四周水深丈餘柳三重傾水銀爲池地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虎頭諸之劍魚三千勝在焉葬之亡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王珣虎山記曰山大勢面西周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趺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註張正見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曰滄波壯鸞島洛邑道崇華若峻羊腸溜深澗無底風幽谷自涼寥沉餘玉氣細隱絕星光夜露多

書影一：宋紹興浙江地區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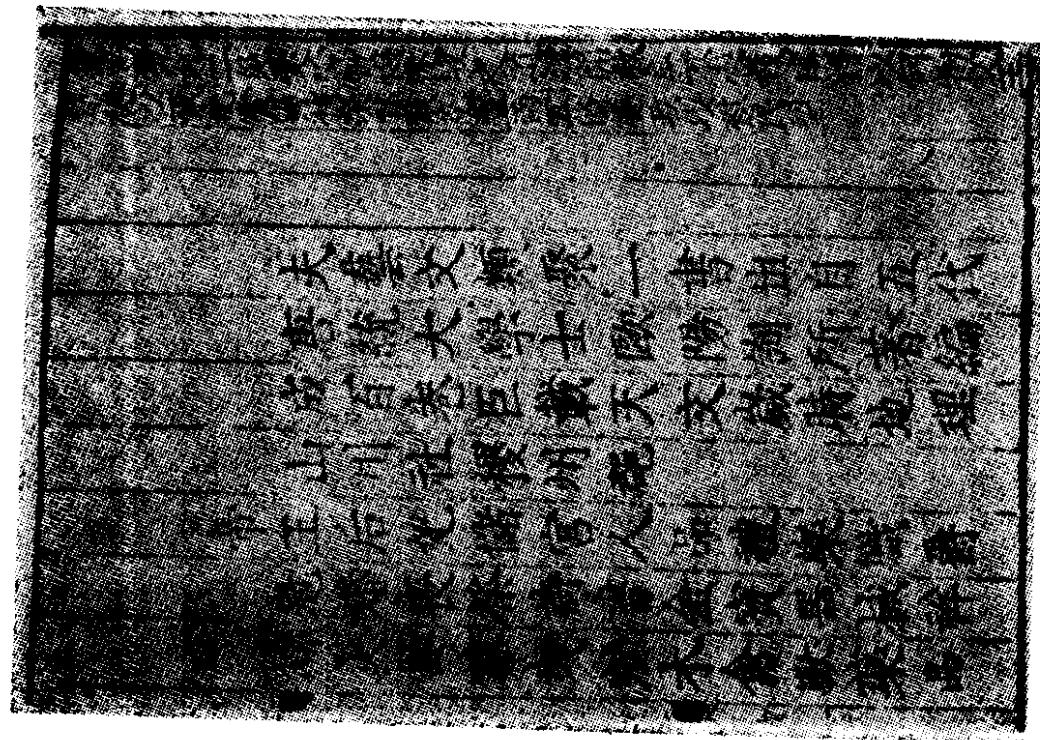
書影二：明正德錫山華氏鶴雪堂活字本（北京圖書館藏）



辨名曰：達也。如五方雖所不同，可常用也。又曰：三境遺今也。論三才
亦天地人也。如分上中下三也。在應與德化相接處所，須是上下審
乎有無也。地者，人之本也。人者，天之子也。天地人者，三才也。江河湖
海，九州土宇也。化育生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子也。王以皆上至矣。時者也。時與好惡，人也。道家所謂許教也。究其好惡，則別
於教也。故曰：「人能順物，故能成物。」人能順物，故能成物。此非比事
情，成名而歸德，稱實也。上天垂文象，示節度，吉也。如天術
物法，人制作物，皆成物也。陽德法天，而陰德法地。官曰：安事左氏傳，
爲今在太史館。蓋以左氏傳，猶猶於史記，而左氏傳之於地，觀而勝之。

書影三：明代中期宗文堂刊本（浙江圖書館藏）

書影四：明宗文堂刊本卷末的刻書識語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百穀部 稗 禾 稻 粳 粧 粟 豆 麻 大麥
布帛部 素 繼 紡 絞 罷 布

穀

周易曰中有岱岳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大則有魚鹽之歲也不熟五穀無不熟周官曰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宜種麥青州宜稻冬兗州宜三種
雍州宜黍稷幽州三種冀州宜黍稷并州宜五種五種者黍稷麥稻大豆九穀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朱博傳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帝不天也外祀后稷以作農事傳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壘而郊郊而後耕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春耕朱薦穀廟此皆始命百官始收穀故梁傳曰一穀不升曰陳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饑大饑則君食不兼味妾不衣不縫有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

書影五：明嘉靖初年天水胡續宗在蘇州刊本

重印說明

《藝文類聚》是我國編輯時間較早而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大型類書之一，是古代一部百科性質的資料性圖書。它的主要貢獻在於保存了唐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大量的詩文歌賦等文學作品，對整理古籍、批判繼承古代文化遺產，有重大的參攷價值。

《藝文類聚》成書在唐武德年間。南宋紹興年間有過刻本，然而後世不多見。留存較多的是明刻本，但也不易見到。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出版汪紹楹先生整理校訂的《藝文類聚》，用上海圖書館當時入藏的極為難得的紹興刻本為底本，校以諸明刻本及明刻校宋本，改正了宋本原刻的不少錯脫衍訛之處，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個較實用的本子，現據以重印，以滿足讀者的需要。

由於《藝文類聚》卷帙浩大，又經歷代傳抄翻刻，錯訛之處甚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印本雖訂正了不少地方，但仍遺留一些問題。如卷四歲時部三月三日篇潘尼《三日洛水作詩》條（本書六四頁九行）：『羽觴乘波進，素卵隨流歸』句，『素卵』當作『素卯』，喻曲水之流杯。卷十一帝王部總載帝王篇《春秋繁露》條（一九八頁倒三行）：『德俟天地者稱皇帝』句，『俟』當作『侔』。卷十五后妃部后妃篇范曄《皇后紀論》條（二八九頁倒三行）：『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贏國』句，『秦芊太后』當作『秦芊太后』。《史記》秦昭襄王母宣太后，楚女，姓芈氏，芈為楚之大姓。芈，訛作芊，再訛作芊，故『芊』字實誤。倘若一一覆按原書（現存的或其他文獻所徵引的），詳加校核，必多訂正。再者，《藝文類聚》編錄，

雖稱精審，但仍有魯莽滅裂之處，例如，卷六地部塵篇《山海經》條（一〇九頁倒三行）：『黑山之南有玄蛇，食塵。』按『塵』，今本《山海經》皆作『塵』，鹿屬動物。『塵』當作『塵』，涉形致誤；入於地部塵篇，顯然是編錄時的錯誤，而非後來傳鈔傳刻致謬。又如，誤『抔』（音摶 pōu）爲『杯』（音 bēi），竟入杯篇（卷七十三雜器物部《漢書》條。此一錯誤，宋代王欽《野客叢書》業已指出），等等。因此，還有待於對原書進一步地整理和研究。但此項工作其量是相當大的，需要有較長時間的反覆考覈，而非短時間所能完成，加上在舊紙型上不宜多作挖改，因而要俟諸異日了。這次重印，僅改正了個別明顯的斷句失誤之處，其它都未作改動。

爲了便於讀者索檢《藝文類聚》所引到的作者及他們的文章，我們補編了一個索引（包括人名和書名篇名兩部分），印在書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八月

前　　言

自《皇覽》而下，歷代的封建王朝曾經屢次運用政府的力量組織人力，搜檢皇家藏書，編纂成不少的巨型類書。這些類書匯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加以分門排比，其性質約略相等於現代的百科全書和資料類編。它們在當時起着傳授知識、臨文備查的作用，而主要為封建統治者的政權服務。對後世讀者來說，由於它們集中而又類別地保存了歷代繁富的文獻資料，因而具有了較為可貴的參考價值，為學術研究者所重視和使用。然而這些古類書也多有散亡，在遺留下來的幾部規模較大的類書中，保存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的，《藝文類聚》是頗為重要的一種。

《藝文類聚》是唐代開國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的。下詔的年份，據《唐書》七十三《令狐德棻傳》的記載為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唐書》一八九上《儒學·歐陽詢傳》記為武德七年（六二四）詔修，乃是誤以成書上奏之年為詔令修書之年。受詔參與編修的共十餘人，《唐書》一八八《孝友·趙弘智傳》云：“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今能考知姓名的有給事中歐陽詢、祕書丞令狐德棻、侍中陳叔達、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趙弘智、齊王文學袁朗等人。對於領修人的問題，《四庫全書總目》以存疑的口吻說：“殆以詢

董其成，故相傳但署詢名歟？」關於這一點，其實是可以完全確定的，因為（一）全書的序文由歐陽詢撰寫；（二）從《唐書·經籍志》它是以母嬰的《古今書錄》為據的。以來的本書作者著錄，向來但具詢名；（三）據《唐會要》，本書由詢奏上，就更可以明確了。

李淵原是個大官僚地主，他利用當時農民起義軍已經動搖了楊氏統治基礎的形勢，發兵反隋，趁機攫取了政權，而後又逐步消滅了各地的農民軍和割據勢力，建立起一個新的地主階級統治王朝。然而由於隋末農民起義所顯示的人民羣衆的巨大力量，迫使新王朝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推行和改革均田制、租庸調法等，以冀籠絡人心，安定秩序，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有了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唐帝國才日趨強盛。李淵為了要顯示新王朝的彬彬之盛，就有了大規模地官修羣書之舉。在詔修《藝文類聚》的那年，同時詔修唐前列代史。自魏迄陳、隋編修《類聚》的諸人，也有不少被任命兼修史書的工作，如歐陽詢修《陳史》，陳叔達、令狐德棻修《周史》，裴矩修《齊史》。見《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這也可以說明參加編修《藝文類聚》的，都是當時文壇的『一時之選』，而他們兼領史館工作，對充分地掌握修撰類書的原材料也多一有利條件。唐前列代史的工作，《魏史》後停修。拖拖沓沓，直到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才畢其全功，而《類聚》卻迅速地完成了。

《藝文類聚》以三年的時間編成，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六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奏上。見《唐會

要》卷三十六『修撰』。按，『修撰』一類所繫歲月，都是官書修成後的奏呈年月；《藝文類聚》條並確言是年月日『上之』，更無疑義。以此證《唐書》令狐本傳所記詔修年份為確，而儒學歐陽傳有誤。據《唐書·儒學·歐陽詢傳》和《唐會要》的記載，都能確定本書在高祖時已完成。現在書前所載序文，結銜署『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這些銜名應係追改或後人移改的，因為上項官職和爵號全是唐太宗李世民卽位後給予歐陽詢的，從《唐書》本傳、張懷瓘《書斷》卷二和《唐會要》六十四『弘文館』條核對下來，都是這樣。若為成書上奏時的原署字樣，就祇能說是成書已入太宗時代，這是和事實不符的。

《藝文類聚》凡分四十六部，《四庫全書總目》稱『爲類四十有八』，《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又稱『凡分四十七門』。數字上的歧異，都由於對原書卷八十一（藥香草部上）和卷八十二（草部下）的計算法不同所致。《庫目》大約是把藥、香、草作爲三部計。《燕大目》則明確以『藥香草部上』爲一部，『草部下』爲一部。我們覺得，既是標爲『上』『下』，爲與其他占多卷的各部計，還是應該用統一的標準作爲一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全書約百餘萬言。所引用的古籍，據北京大學研究所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統計，共爲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他們輯製了一個《類聚》引用書目，載《北京大學二十五週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我們據以作了約略的分析，得知在這些被引用的文籍之中，現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可以證明《四庫全書總目》一三五所云『隋以前遺文祕籍，迄今十九不存』的估計是接近實際的。這就是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爲今所

不傳之書；而其餘的不足百分之十的徵引，因其所援用者爲唐前古本，例如：本書所引《左傳》，卷五有『昭上』之稱，卷三十五有『僖中』之稱，蓋當時傳本分卷與今不同，僖公、昭公有分卷爲上、中、下者。可以用以互校今傳之本而有可能糾訂其誤繆。遠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華》，就已利用本書。至清代的校勘、輯佚學者治理先秦、兩漢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廣泛地運用這部類書而多能深切理解其價值。

公元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阮元撰寫《仿宋刻太平御覽敍》，有一節說：

『《太平御覽》一書，成於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於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

（載鮑崇城刻本卷首，亦見《擎經室三集》卷五）

阮元的話，說準了一半，也說錯了一半。對的是《太平御覽》確實是保存了許多今天不傳的秦、漢古籍。錯的是，《御覽》所以能够徵引那些文籍，實際上並非純然由於『北宋初，古籍未亡』的緣故。那時候，凡是今天所不見的古籍，也有不少是已經佚失的了。《御覽》還能够加以引用，南宋的目錄學者陳振孫所早經闡明的乃是事實的真象：

『《太平御覽》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家參譯條次修纂。或言

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考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本卷第四十六；二十二卷本卷十四，文字小異。）

《三朝國史》的《藝文志》是代表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家藏書的實際。陳振孫提出的這個證據，有力地說明了宋朝初年編《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古籍，不一定為當時確實存在的；而所以能够徵引的原因在於『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從今天來看，一件更為重要的事實是，那些『前諸家類書』，《修文殿御覽》和《文思博要》也都已失傳，《修文殿御覽》仍餘下敦煌唐寫本二百五十九行，然而是否確為《修文殿御覽》還有問題；《文思博要》祇餘下唐寫本第一百七十二那一卷。祇有《藝文類聚》歸然獨存。《類聚》的完整原貌雖然還有百分之幾存在問題，馮舒說：『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雜亂無緒。』陳揆認為這三卷『似有後人增入處，非率更原書』。還有其他的問題，見後《校序》。然遠非斷編殘簡的《修文》、《文思》之比。

《藝文類聚》在引書上，也比《太平御覽》為謹嚴，可以通過一個事例來說明它。《御覽》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云：

1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鐵室以備之。

2 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

3 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4 又曰：楚人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在今本《韓非子》中，有上述的第1、2兩事，分見於《內儲說上七術》及《十過》兩篇。但無第3、4兩事，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所附《逸文》據《御覽》以輯入之。今查『水激則旱』、『楚人有白猿』二事雖不見於今本《韓非子》，而見於今本《淮南子》。前一事在《說山篇》，次一事在《兵略篇》。根據這種情況，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一）《淮南》襲《韓非》之語，故以《御覽》之引而可得《韓子》的逸文，並從而溯《淮南》之語源；（二）不是別的，而祇是《御覽》的引文安錯了頭。何者爲是，本未易臆斷。然一檢《藝文類聚》，就好像在試管裏迅速地看到了化學反應一般，恍然於《御覽》在這個地方犯下了粗失的毛病，致貽後人以迷失途徑之誤。按《類聚》卷六十軍器部箭門云：

1 《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

2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3 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對照下來，上引《御覽》的第3條的『又曰』本應作『《淮南子》曰』，就是很清楚的事了。吳淑《事類賦》卷十三注引『楚王有白猿』事亦作『《韓子》曰』，而吳淑正是《太平御覽》的纂輯人之一。